

冰心春节剪影:浮世沧桑中的年味

□ 赖浩然



冰心

后来,冰心又在福州过了两个春节,即1912年与1913年。当时,她居住在南后街上,这是一个花灯的世界,整条街上多为灯铺,家门口的“万兴桶石店”除售卖红漆金边的伴嫁桶具外,亦售各式花灯:“上面画着精细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、纱灯、料丝灯、牛角灯等,元宵之夜皆点亮,真是‘花市灯如昼’,游人如织,欢笑满街!”而孩童手中的玩灯更添情趣:“最好的还是灯笼。福州方言‘灯’与‘丁’同音,故送灯数目总比孩子多,取添丁之意。那时弟弟们尚幼,多的那盏总归我。这些灯有纸的、纱的、玻璃的……屋墙上挂‘走马灯’,绘‘三英战吕布’;手中提两眼活动的金鱼灯,另手牵脚下带轮的‘白兔灯’。”墙上、手中、地下的花灯间,十二三岁的少女笑靥如花,花灯为她的童年缀满斑斓色彩。

这期间,冰心开始接触新文学。1913年春节,她收到表兄送的《新青年》创刊号,在文学革命思潮中首次尝试白话文春联:“大海潮平千帆竟,少年笔健万言新。”父亲看后大笑:“这孩子的字里有海风的劲道!”

冰心童年主要在烟台度过,大海、水兵、军舰与炮台构成她的成长舞台;若非福州花灯留下的绚烂记忆,故乡的年味或难与烟台媲美。

烟台岁月·海风中的北国风情

1904年,冰心随父迁居烟台芝罘,在海军公署的四合院中度过了多个春节。

她在烟台的童年,既有海边山上的孤单独往,亦有锣鼓喧天的热闹时节——从前称“新年”,今谓“春节”。那时她家住在烟台海军学校后的东南山窝,附近仅数村落,进市区需越东山,堪称冷僻一角,然“过年”仍是全年最隆重的节日。节前几日,最忙碌的是母亲杨福慈:打点孩子们的新衣鞋帽,备足全家半月肉食。

小冰心见母亲系围裙、挽袖子,往大坛中装裹满“红糟”的喷香糟肉,以酱油、白糖及香料煮卤肉,还蒸数笼红糖年糕。旁立馋嘴孩童,亦有厨师与余妈帮忙。

父亲谢葆璋则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娱乐。海军学校就读的堂哥、姑表兄、舅表兄、姨表兄等足有七八人。父亲从烟台市区买回锣、鼓、箫、笛、二胡、月琴等吹打乐器,奏起来热闹非凡。小冰心挤不进乐队,只得白天放父亲买的鞭炮,夜晚玩烟火;大的如筒状置于地,火树银花,璀璨夺目;最爱那最小巧的“滴滴金”——纸捻卷火药,点燃后嗤嗤作响,迸出点点火星。

初一晨起,冰心姐弟换上新衣新鞋,先拜祖宗(家中不供神佛,供桌仅有牌位、香烛与祭品,此桌酒菜即为新年午餐),再向父母长辈拜年。她所得压岁钱多为一圆锃亮的墨西哥“站人”,均请母亲代为收存。

最有趣的是各村来耍“花会”的农民——冬闲村民扮演“跑旱船”“王大娘锔大缸”等节目,女角多为村中青年。鼓乐前导,孩童簇拥,至冰心家门口便围聚演唱,乐声伴滑稽唱词,引得众人笑声不断。表演毕,家人以烟酒、点心和红包慰劳,此时刚去,彼时又至,最先来的总是近邻金钩寨的花会。

冰心在《往事(二)》中记录:1911年春节,辛亥革命刚过,父亲守岁时为她讲“驱逐鞑虏”的故事,窗外月光照在他海军制服的铜纽扣上,“那一刻我忽然懂了‘家国’二字的分量”。

上海尽孝:陪慈母走完最后的岁月

1929年12月,燕京大学梅香未散,冰心已擦着中国旅行社的船票订单南下。彼时国历推行,元旦假期为唯一归省时机;津浦铁路因军阀混战中断,她只得取道平津铁路赴天津,再转海轮往上海。12月18日,北平站人头攒动,二等票售罄,她咬牙购了两张昂贵的特快车票,与丈夫吴文藻同赴天津。国民饭店寒夜,焦虑引发慢性肠炎,她上吐下泻,次日仍强撑病体登船——官舱虽为“软卧”,七八平米的空间却塞四铺乘客与行李,孩童哭闹、柴油味与汗臭交织,三天三夜颠簸中粒米未进。

12月22日晚傍,浦东码头寒风里,冰心踉跄归家。推门脱口问“太太好了吗”,俯身唤“妈”时,见母亲杨福慈骨瘦如柴,气息微弱,仅能以悲喜目光相迎。家人告知,为瞒病危,谎称女儿自行返家,母亲却早穿空:“她在船上,许是想着自己已是没娘的孩子了。”父亲谢葆璋悄叹:“我六神无主,心都碎了。”

此后半月,冰心与弟妹轮流守夜。母亲骨痛难忍,却总劝:“我好多了,你们去睡。”见女儿衣衫单薄,挣扎提及黑骆驼绒袍子:“去年见文藻时,我就穿这件。”弥留之际仍记挂父亲六十大寿、北平读书的二弟与海外漂泊的小弟,对冰心喘息道:“辛苦你了,等我事了,你好好睡几夜便回北平。”佣人叹道:“太太永远是这样疼人。”

1930年元旦刚过,1月3日为父母结婚四十周年。冰心购来熏鱼、烧鸭,于母亲床前设小圆桌,点亮红灯,推父亲坐床头笑称“新郎来了”。

母亲望团聚家人,虚弱而笑——她幼年丧母,却得良人、育佳儿,此生无憾。

1月5日夜,母亲突高声与父亲争执:“把安眠药给我,我不愿再拖!”冰心跪伏哀求,母亲却只望父亲。药丸入喉时,那句“又不是今后就见不着了”令父亲骤然悲戚,冰心浑身战栗。次日回光返照,母女彻夜长谈,母亲竟觉饥饿,短暂回温终成诀别。1月7日腊八节,母亲在“放我去吧”的哀求中溘然长逝。

万国公墓钢棺中,除家人青丝,尚有母亲珍藏三十年的冰心胎发与“斐托斐”金钥匙。下葬时,她感到自己的那颗心随母亲沉入了黑暗中。

母亲逝后,父亲骤老,弟弟们茫然无措。冰心强压悲痛,如母亲般照料家人;为父亲暖被,替弟弟规划前程,重织散落亲情。1931年,她和家人返回北平,将沪上哀恸化为笔尖力量。多年后,三孩绕膝,她方悟:母亲的生命,正以爱与责任的形式在她身上延续。

北京成年:作家笔下的春节哲思

1923年,冰心赴美国留学前的最后一个春节,在北平铁狮子胡同寓所度过。此时她已发表《繁星》《春水》,成为文坛新星。日记中写道:“除夕夜,弟弟们在院子里放烟花,我却在灯下给母亲写信,忽然觉得‘团圆’二字,原是离别最好的注脚。”是年作散文《新年试笔》,将春节比作“时间的门槛”:“我们跨过去,带着旧岁的记忆,也带着新年的期盼,恰如门前的老槐树,落尽叶,却藏着满枝的春。”

1931年春节,冰心执教燕京大学,恰逢九一八事变后首个新年。她拒友人宴饮之邀,于寓所写《给小朋友的新年信》:“今年的爆竹声里,有东北同胞的哭声。孩子们,愿你们的新年愿望里,多一份对国家的担当。”该信发表于《晨报》,引发热烈反响。

冰心在春节期间始终保持着简朴温馨的传统。外孙陈钢回忆:“外婆家的年夜饭永远是四菜一汤,她会亲自包‘元宝饺子’,把硬币包在里面,谁吃到就寓意新年吉祥。”1994年春节,冰心在给小读者的贺年卡上写道:“春节是爱的节日,爱家人,爱朋友,爱这生生不息的世界。”

她晚年在《我的春节记忆》中总结:“我经历过清王朝的最后一个春节,也见证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。时代在变,但春节的内核不变——它是中国用爱编织的时间纽带,连接着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”

林徽因的春节风雅

□ 李玉林



林徽因

林家的年节总带着书香气息。作为晚清名士林孝恂的孙女,林徽因自小跟着祖父读诗词。大年初一的家庭宴会上,祖父会让孩子以“春”为题作诗,徽因曾写下“荔红时节又迎春,乡音未改鬓毛新”的句子,被祖父赞为“有易安风骨”。福州特有的“红团”(糯米制成的圆形糕点)是她的最爱,祖母总把红团捏成莲花、鲤鱼的形状,说“我们徽因要像这红团一样,日子过得团团圆圆”。多年后,她在给女儿梁再冰的信中还提起:“北平的点心再精致,也不如老家红团的糯米香。”

1930年代的北平,林徽因的“太太客厅”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,而春节期间的聚会更添几分热闹。

1933年除夕,沈从文、金岳霖、费慰梅等好友围坐炉边,林徽因亲自下厨做了一道福州菜“佛跳墙”,陶罐里的海参、鲍鱼在文火慢炖下散出浓郁香气。金岳霖捧着酒杯打趣:“徽因,你这菜比你的诗还动人。”她笑着回敬:“金先生要是能写出‘你是人间四月天’,我就天天给你做。”窗外飘起小雪,梁思成弹起了钢琴,林徽因跟着哼唱《送别》,壁炉里的柴火烧得噼啪作响,将寒冬的夜烘得暖意融融。

据费慰梅在《梁思成与林徽因》中回忆,1935年春节,林徽因特意为外籍友人准备了“中西合璧”的年夜饭:既有北平的涮羊肉,也有福州的鱼丸汤;饭后的甜点是她亲手做的“核桃酪”,上面撒着从家乡带来的桂花蜜。席间,她拿出刚完成的《平郊建筑杂录》手稿,兴奋地讲述发现唐代建筑的过程,说到兴起时,竟忘了给客人添酒。梁思成无奈地摇头:“你呀,一谈起古建筑就像孩子过年。”那一刻,她眼里的光芒比窗外的烟花还要亮——对她而言,探索中国建筑的奥秘,或许就是最珍贵的“新年礼物”。

1940年,抗战烽火中,林徽因一家辗转迁至四川李庄。这座长江边的小镇没有北平的繁华,春节却自有一番质朴的温暖。林徽因肺病加重,整日咳嗽,但她仍坚持在除夕那天打扫屋子。她用报纸剪出简单的窗花,贴在土墙上;梁思成去镇上买了两串鞭炮,说要“驱邪驱晦气”。女儿梁再冰在日记里写道:“妈妈坐在竹椅上,看着爸爸给弟弟削木枪,阳光照在她苍白的脸上,像开在寒冬里的花。”

物资匮乏的年代,年夜饭只有一碗腊肉炖萝卜,林徽因却把它做得格外香甜。她给孩子们讲福州春节的故事,说祖父曾带着她去看“游神”,鼓乐声里,戴着面具的“八将”威风凛凛。说到动情处,她轻轻咳嗽起来,却笑着说:“等抗战胜利了,咱们回北平过春节,我带你们去逛厂甸庙会。”那个夜晚,没有爆竹,没有盛宴,只有煤油灯昏黄的光,映着一家人相依的身影。多年后,梁再冰在《我的母亲林徽因》中写道:“李庄的春节是苦的,却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团圆。”

1954年春节,林徽因已住进北京同仁医院。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,她却只能躺在病床上,透过窗户看别人家的春联。梁思成带来了她最爱的海棠花,插在玻璃瓶里,她说:“这花比年画还好看。”无论身处繁华还是困顿,她始终像一朵盛开的花,用温暖与诗意点亮岁月的灰暗。

她的春节记忆,是福州南后街的荔枝红,是北总布胡同里的文人雅集,是李庄岁月的蜡梅香。正如她在《窗子以外》中写的:“所有的活动的颜料,声音、生的滋味,全在那里的,你并不是不能看到,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的窗子以外罢了。”而春节,就是她推开窗看到的最美风景——既有传统的温情,又有新知的光芒。

北平沦陷时期的春节生活记录

□ 鲁文

董毅出身于一个旧官僚家庭,原籍福建,随父母在北平居住。1938年9月,董毅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,毕业后到伪联合准备银行(简称“联银”)做事,是一名生活在沦陷区的中国青年。

董毅有记日记的习惯,北平沦陷后,饱尝外寇奴役、社会动荡之苦,日记记录了其个人经历、家庭生活、人情往来以及不甘为亡国奴的心路历程,其中1939年、1940年、1941年、1942年、1943年的日记完整记录了当时春节期间的活动,反映了日伪统治时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、社会心理和风俗礼节。由于北平沦陷时期普通市民生活的资料存世不多,关于年节的书写尤为缺乏,从某种意义上讲,董毅日记可谓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。

由于日伪的严酷统治,董毅日记多是记载生活琐事。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:“现在的日记翻开来看看,只注重自身的记录,亲戚朋友都很少记载,关于国家政治更是绝口不谈。处此时局,也只学金人缄口,概不过问得好。”

1939年:看电影过年

董毅父亲董元亮曾任浙江劝业道、奉天财政厅厅长等职,是清末民初的诗人,与许多文人墨客、政界名流都有往来。董元亮有6个子女,原配夫人早逝,生有一子一女;后纳妾张令华,育有三子一女,分别为董毅、董刚、董恭和董淑源。受父亲影响,董毅对文学很感兴趣,考入辅仁大学后,选择了国文系。

除夕早上,家里就开始忙碌了,先是挂画,“又这个又那个的也不知道干了多少零碎事”。董家是老派家庭,过年过节自然有很多规矩,但家里有仆人,这些事用不着董毅,“自己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做”,于是便到平安电影院看电影去了。电影叫《苏伊士运河》(当时译作《苏黎世运河》),是一部美国片子,1938年10月在美上映,几个月后便传播到了中国。关于这部电影,董毅在日记中写道:“片子可以算是有点历史性的,是描述法少年雷赛布情场失意以及开发苏黎世运河的艰难,在困苦中奋斗的经历。”看完电影后,董毅在街上买了许多东西,回家后“上供,拜祖先,又辞岁,照规矩表演一番”,这一年除夕便结束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两个仆人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,“像过年的样子”。亲朋好友来家拜年,第一个来的是“斌和她母亲”,斌是董毅的初恋女友,两人如胶似漆,几乎天天在一起。但斌称呼董毅“表叔”,两人交往遭到家人和舆论的反对,

董毅又是一种风味”。

向大哥大嫂辞岁回家。董毅记道:“今天晚饭分外丰富(‘分外’只是比我们日常所食而言),大家也吃得肉足饭饱,饭后无事围坐着看书报。”日军加紧了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,北平民众生活日趋艰难,日伪推行粮食配给制度,后来华北出现大饥荒,粮食配给也不能保证,物价飙升。这种情况在董毅日记中如实展现:

昨天买三块豆腐,两把菠菜,代价两毛。大米一百八十克一石,次米三毛七八一斤,还没处买;面一元八一斤。其余无不奇,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!言来不胜浩叹,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。

董毅没有收入,只有靠父亲留下的遗产和典当物品维持生计,年夜饭“分外丰富”背后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。晚上九点多钟,董毅与弟弟一起逛街,想起去年此时与斌同行去大栅栏朋友家的情形。而斌行将订婚,“今年已有如此差别,不知明年更变成什么样子”。

1940年:在女友家守岁

董家忙了半个月,准备今年的除夕年夜饭,董毅记述甚详:“菜做得也差不多了,一大锅的猪肉、肝、肚子,一大锅白菜汤,两碗米粉面,两碗八宝饭,一碗炸酱,一碗栗子肉,一碗海参烧肉,一碗酸辣汤,这就是我们的年菜。”

下午董毅看了会儿书,开始吃年糕,接着吃年夜饭。这是董元亮离世后的第一个除夕,董毅非常难过,“心里翻了底似的,于是也就吃不下东西去了”;饭后,董毅带着弟弟妹妹去西院上供。父亲去世后,董毅与大哥分家另过,作为新家庭的长子,所有事情都要他出席奔波,甚至弟妹的家长会也由他出席——董毅代替父亲挑起了家庭重担。

晚上,董毅带着弟弟和斌去大栅栏朋友家玩儿,大家一起做游戏,直到凌晨才回家。路上

董毅告诉董毅,这是她第一次这么晚回家。她还和董毅撒娇:“你要是在我家陪着,我就不再睡觉!”董毅答应了她。到董家已经两点多了,董毅陪着斌和她的妹妹到房间,三个人坐在床上,用被子盖着腿守岁。董毅给他们讲故事,后来又掷骰子,“消磨这残夜”,天亮后才回家。

1942年:外出拜年

按照老规矩,三年守孝期间不能到外人家拜年,今年制满,董毅腊月就发出了二十多份拜年帖子,先生和同学都有。

物价比去年又贵了许多,年夜饭只做了六个菜,一家老小吃了团圆饭。第二天,董毅穿了新袍子,外出拜年。中午回家吃了饺子,午后带了茶叶和糖果去女友刘淑英家。

刘淑英是董毅的辅导同学,大学四年级时相识,很快便陷入了爱河,两人的交往得到双方家庭默许。到刘家后,董毅见她穿了一件短皮大衣,没戴眼镜,头发随便便——情人眼里出西施!董毅看来看去都是那么美好。

两人一起到北房给刘淑英父亲拜年,然后到她家谈笑,不知不觉到了下午六点多钟。刘淑英留董毅在家吃饭,他不好意思,告辞回家,走到菜市口,“还有警察检查行人”。董毅虽然软弱善良,但毕竟是知书达理的青年学生,对屈辱的亡国奴生活深恶痛绝,在日记中用含蓄的文字记录了日伪压迫百姓的恶行,表达了他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。

1941年:吃不饱的春节

这一年的春节,董毅过得索然寡味,因为斌已经与他分手,春节后就准备订婚了。

除夕这天,佣人陈媪请了假,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,董毅心中烦闷:“午饭又耗到一点多才吃上,还得自己洗碗,真烦。”午饭后,独自跑到真光影院看电影《新月》,这是一部美国歌舞片,不好看,只有几首新歌倒还可以听。晚上董毅去西院上供,拜过祖宗又去拜父亲遗像,“心中另外一种悲戚”。大哥大嫂都在家,“大家在一



董毅日记手稿

年后,董毅四处托人求职,好不容易在伪联合储备银行当了个小职员。

除夕这天,董毅照常上班,“(工作)今日较少,赶完才下午三时许”。日本人试图通过控制节日来削弱中国人的凝聚力,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的假期被严格限制,一般不放假或放假一天,董毅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。

北平沦陷后,日伪的掠夺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,经济形势急剧恶化,物价飞涨,生活物资严重匮乏,老百姓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。董家属于社会中上阶层,董元亮留下了一些遗产,董毅也有固定的薪水,但今年也难以以为继。董毅在除夕日记中这样写道: